

陈建华 著



# 从革命 到共和

清末至民国时期  
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  
转型/陈建华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 - 7 - 5633 - 9016 - 8

I. 从… II. 陈… III. ①文学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民国②电影史—研究—中国—清后期~民国③文化史—  
研究—中国—清后期~民国 IV. I209.52 J909.2 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877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

开本:650mm × 960mm      1/16

印张:26.25      字数:34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革命话语与文学革命

- “革命”话语的转型与“话语”的革命转型  
——从清末到 1920 年代末 ..... 3
- 孙中山“革命”话语与东西方政治文化考辨  
——关于“革命”的历史化与“后设”诠释问题 ..... 21
- 民族“想象”的魔力  
——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 65
- 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从《泰西新史揽要》到《泰西历史演义》 ..... 85

## 报刊杂志与政治文化

- 《申报·自由谈话会》  
——民初政治与文学的批评功能 ..... 121
- 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  
——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1921—1926 ..... 141
- 1920 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  
——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 ..... 171

## 文学、电影与都市文化

## 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

——周瘦鹃《影戏话》读解 ..... 205

## 格里菲斯与中国电影的兴起

——1920年代通俗文学与电影的整合及其文化政治 ..... 237

殷明珠与1920年代初好莱坞明星文化 ..... 287

## 文本、文学主体与欧美现代主义

## 现代文学的主体形成

——以周瘦鹃《九华帐里》为中心 ..... 317

## 质疑理性、反讽自我

——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现代性 ..... 343

## 张爱玲与塞尚

——1940年代的“写实”与“超写实”主义 ..... 377

## 自序

本书是有关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文学、电影与文化的研究，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篇文章，是讲清末“革命”话语的；第二部分的三篇探讨民国初期报纸副刊与文学杂志的政治文化；第三部分的三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与都市文化；第四部分讨论的是文学文本、类型与文学主体，最后两篇是谈张爱玲的，涉及1940年代欧美现代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接受和挪用等问题。

第一篇文章原是2005年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作的报告，谈到自己怎么开始“革命”话语研究的，我想那一方面是在海外，得益于那种乡愁中的距离感，另一方面我对文本辨证的兴趣则受赐于过去在大陆的学术训练。当然也谈到福柯了，勾起在美国学院最初与文化理论遭遇的惊喜和困惑，其实那时的北美学界对于福柯几乎是一面倒，只是近些年对他有了更多的批评，有更清晰的认识。那篇文章除了回顾，也提出了新的问题。那时正在继续茅盾早期小说的研究，触及19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争论，却发现“革命”已经铺天盖地，巨浪滔天。随着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三民主义革命”仿佛继入大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情势下，共产党人转入地下，以文学为战场争夺“革命”主权，“左联”的产生意味着反抗力量在理论和策略上的整合。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过程中，话语语码随之变化，“五四”的反偶像传统转向党派和群众政治。很快地，这样的语码转换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如茅盾的小说《虹》描写梅女士的成长历程，从《新青年》到“五卅”运动，这

两点一线规范了她对“革命”的价值认同。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在1950年代之后的现代文学史里这两点一线成为经典的历史框架，北伐这一段及其“革命”含义、包括在文学中的表现就被排除了。使我更觉兴味的却是发自角角落落的革命之声，那些都市消费性的报纸副刊和流行杂志在欢呼北伐之中，“革命”成了无数个随意装扮的女孩子，和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不协和的和音，之所以如此，因为背后还颠颠歪歪地站着“共和”的机制，虽然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对此作深入讨论。

第二篇文章意在解析孙中山的“革命”神话，原在《“革命”的现代性》一书中讨论过，其单独成篇时则突出了他如何在世界革命语境中做出文化选择的，也附带提出了历史诠释的方法论问题。那时张灏先生还没有从科大退休，幸能有机会向他请教。他认为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可有多种多重的视角，不限于词语的历史诠释，真乃有味之言。的确，当定于一尊的“正典”瓦解之时，理应释放出无量书写的可能性，这使我想到“重写文学史”、“重写电影史”之类，其实对于“革命”也当如是。当然这更是个伟业，正须大音声起，呼唤新的历史哲学，发扬重写“革命”的活力。第三篇是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世纪初经典之作。自甲午之后，国人意识到老大帝国腐朽而臃肿，先在文化上作瘦身运动，这方面梁启超厥功甚伟。如他所提倡的一系列文学革命，也是对传统文类的简化，但相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而言，“小说界革命”是后来者居上。他对小说是抱有偏见和戒心的，在谴责旧小说是造成中国腐败文化的总根源时，对于“海盗”的《水浒》、“诲淫”的《红楼》甘之如饴的群众也痛心疾首。因此梁氏的“小说界革命”与其“新民说”同时出台，并非偶然。所谓“新民”，仅存在于他的以英美公民社会为楷模的未来中国的想象之中；所谓“群治”应倒读为“治群”，“新小说”即担当治群之具，具有培养“新民”的启蒙、规训的功能。第四篇考索19世纪以来拿破仑的中国传奇。有别于其他外来概念的翻译，“拿破仑”这一指符的传播方式丰富多样而动人心魄。伴随着他的生平事迹带来了花都巴黎的浪漫想象和法国大革命的恐惧，而中国人对于近代世界史和西方民主政体的了解也渐趋深入。这已是西学东渐，为1895年之后整体拥抱西学作了铺垫。到“小说界革命”兴起，拿翁形象为之一变，被通俗化、漫画化。他的英雄末

路和风流韵事被大肆渲染,也因此变得可怜可亲起来。在探究过程中我常常自己会莞尔失笑,无意间使我涉足于普通人的心灵地带,而这方面的研究还犹如荒村鸡鸣。这篇文章似乎意味着我近年来的研究趋向了。

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以都市“消闲”副刊与杂志为中心。《申报》是上海大报之一,其副刊《自由谈》创始于民国初年,主编者王钝根、周瘦鹃等一向被视作“礼拜六”派。《自由谈》上的“游戏文章”和“三言两语”栏目对于北洋军政当局冷嘲热讽,或指名痛骂,代表了某种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意”。谈周瘦鹃“报屁股”那篇收入《文人论政》一书中,出版后见到南方某报的一篇评论,刊出周的照片,称之为“启蒙者”。我想这有助破除对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一些成见,虽然这个名谓本身负荷着“正典”的语码。讨论“通信”和“谈话会”栏目的那篇论文围绕1920年代初“新”“旧”两派之间的文学争论而展开,旨在描述文学杂志中公共论坛的不同理念及社会效应。上海本是旧派杂志的天下,茅盾接手编辑《小说月报》,等于让“新文学”拔了“白旗”,由是顿起杯葛。一时间争论愈烈,不仅是商战,也体现了新旧各自的文化取向及印刷文化中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杂要素。旧派先是进攻,继而沉默,主要在白话、文言问题上失手,但在争论过程中显得绅士风度,适可而止。新派则战斗性强,大有非我莫属之势,而《小说月报》的“通信”栏目所隐含的“读者”发挥了“政治正确”的效能。当然一听到“救亡”,旧派就不得不乖乖缴械了。

接下来三篇文章都与中国早期电影史有关,逼我看了不少中外电影方面的东西。纠正一些史实的谬误还在其次,更为我关注的是电影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在西方把电影当作“艺术”看待有个演进过程,在中国也是这样。如周瘦鹃把电影和小说相提并论,皆为“开通民智”的“锁钥”,在大众传媒与现代社会的认识方面,这大约是继梁启超之后最富革命性的宣言。不过那也是经过他的一番情感和文化上的调适之后,其中文人趣味与抒情文学传统在那里把关验收。同样格里菲斯在中国走红,多半靠的是其爱将丽琳·甘许在银幕上的丰富“表情”,体现了电影的魔力。而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的殷明珠,却是一个挪用好莱坞明星文化的佳例,紧密扣联妇女解放、时尚杂志及商品消费等本土文

化的现代性追求。

的确，作为影迷的周瘦鹃在《九华帐里》这篇小说中不自觉地被现代视觉装置所控制。当新郎对新娘悄悄作枕边语时，那床帐具有银幕效果，在满足读者的窥视欲。这样的双重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卧房和沙龙在同一屋檐下，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是互为依赖补充的。新郎的甜言蜜语夹杂着家庭伦理、国耻与个人奋斗的叙事，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一种合乎新潮的“爱”的说教，其中蕴涵着小市民式的“想象共同体”，对于发展中的城市经济秩序充满着玫瑰色乐观。

最后两篇以张爱玲压轴，将视阈移到了1940年代，对于现代主义的中国风景投以惊鸿一瞥——华丽而荒凉。或许觉得对于这位“临水照花人”自恋的一面已有不少研究，我想较多强调她“妇人性”所含的温馨、超越的层面。波德莱尔和塞尚犹如通向现代主义的门槛，在中国也是如此，而张爱玲属于少数登堂入室者，仿佛画界里的林风眠。她不喜欢“浪漫主义”或“唯美派”，对塞尚却情有独钟，但她不迷信现代主义，对于“真实”如古典般执著，她的奇幻小说精擅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描写，其文本“底子”却编织着金碧辉煌的唐三彩。“参差的对照”作为张氏的招牌笔法，据她自云，那是受到中国传统“配色”法的启迪。我想她终究是出身于最后的贵族之家，那自小笼罩的鸦片的气氛交织着她的悔恨与痴迷，不断萦绕追随她后来的写作，从中孕生出不中不西、似真如幻的文学境界。

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大多属于发掘“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工作，虽然不尽在文学方面。所谓“从革命到共和”，只是指从清末到民国的时段，并没有历史必然进步或英雄造就历史的意思。事实上革命和共和形影不离。1913年民国还在襁褓之中，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即遭否定。1928年6月6日阎锡山带兵开进北京城，满城飘扬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欢呼全国统一，代表共和的五色旗至此寿终。这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插曲后人很少提起，但在当时少数有识之士中引起震动。看一下鲁迅的《而已集》，在《扣丝杂感》中借“革命尚未成功”而加以发挥：“既然已经成功或将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力和义务。”对于即将出现的政治专

制表达了忧虑。《小杂感》里：“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得冷嘲。而他竟不知共和使人们变得沉默。”当“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铺天盖地而来，“共和”随之变质。另一个是陈寅恪，其盛赞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语为世传诵，然而据学者考证，此文撰于1929年，在王氏弃世二年之后，陈先生实乃有所针对，而清华园是最早推行国民党党治的高校之一。

这些文章多数探讨民国初至1920年代以上海为主的都市文化，集中在电影和流行文学等大众传媒方面。我们可看到其浮世繁华、争奇斗艳的盛况——一种半殖民条件下不免畸形的都市发展。从整体走势看，文学、演艺与电影的合流从民国初即已开始，郑正秋、张石川等从事电影和改良新剧时，包天笑、王钝根、周瘦鹃、徐卓呆等都来帮衬，或写剧本、或写评论、或参与演出。嗣后他们分道扬镳，到二十年代中期明星公司以《孤儿救母记》奠定本土电影之后，又乘胜会师。二十年间里这些人代表了上海大众传媒的主干，当然还有无数枝枝叶叶的生长。这种娱乐文化，正像《礼拜六》杂志鼓吹消闲，其实是为上班族做心灵按摩，然而以阅读代替“晚九朝五”，骨子里继承了梁启超的“新民”启蒙。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发展以“小家庭”为核心的都市消费的社会模式，在实践一夫一妻制及其爱情、社会和性别规范方面，几乎在移植19世纪维多利亚文化，但另一方面对于“现代性”欲迎还拒，诉诸传统的“情教”及伦理价值来抵御其“人欲横流”。

在民族革命的大潮冲浪底下，与其说郑正秋、周瘦鹃他们是在维护现状，毋宁说是在民族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夹缝里开拓一种与“共和”理念相连的新文化。中国历史上朝代兴亡，“革命”如周而复始，无时不有，而民国宪政却是无根之木。他们的文化实践即在解读某种“共和”的涵义，在兑现立国之初它给国民的种种自由且加以法律保证的许诺。这样的历史经验跟我们今日所处的现实环境更为切近更有借鉴之处。如近年来一些研究民国时期的著作所揭示的，在司法、教育等领域中贯穿着一种“独立”的思想传统，这在郑、周等人那里则体现为某种“自主性”。他们大都是些低调的实业文化人，在半殖民和民族主义的特殊境遇里努力发展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在商业上打造本土的

消费共同体,在电影方面与好莱坞相抗衡即为显例。

历史书写中重构与记忆联袂而来,而作为专业性的书写,史料与理论也纠缠不休。就理论而言,在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大约是安德逊的“想象共同体”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之论了,我的文章里也处处可见。其实这不过是最近二十年的事,理论的运用或许有季节性,看看遍地风流,却是落地的烂熟果子。李欧梵先生常告诫,在中国境遇里安德逊或哈贝马斯各有局限性,而把两者作蒙太奇并置,却另有一种启迪。20世纪中国不尽是一部民族解放史,也在实践“第一世界”的历史经验,国族想象与公私空间交缠在一起,别有目眩神旺的光景。

如果有的文章有些新意的话,多半是受到近年来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的鼓舞,游走于思想史、文学史或电影史的三不管边缘地带。那也是研究生时期养成的习惯,喜欢作个案研究,在收集材料过程中却顺着感觉走,常会给一些有意味的历史细节带来惊喜,回味中衍生出新的课题,引向新知的探索。记得朱熹说到他阅读经典的经验,仿佛进入了一座城池,其间街衢楼宇令人应接不暇。我觉得自己也沉浸在文本和都市、历史和人心的迷宫里流连忘返,漫无底止了。

我2002年来香港之后,授课之余必得做研究,此书即为部分成果,其中浸润着师友、同事和学生的鼓励、关心与切磋,令我感铭至深。其中一些研究课题获得科大人文社会学院的研究经费的支助,也得到香港大专教育资助委员会研究资助局2007—2008年度专题研究计划(RGC,编号640507)的支助。本书的出版出自林贤治先生的建议,而得到郑纳新先生慨然惠允,另外竺金琳女士和魏东编辑都付出辛劳,谨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09年6月于京沪旅次

# “革命”话语的转型与“话语”的革命转型

——从清末到 1920 年代末

众所周知，自 90 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告别革命”，这个告别是潇洒的、嘉年华式的，但不那么容易、不那么从容自在。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割断革命年代，在许多方面仍然生活在其余热之中。在我住的旅馆，每天送一份免费的《文汇报》，让我有点惊喜的是，昨天的报纸有一个大标题，号召“掀起真正的阅读革命”。革命似乎还没有被忘记，大概是《文汇报》还有点老传统。然而应当注意，这个“阅读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动辄“刺刀见红”的政治革命，而是指日常的、和平的变革。这样具有普世意义的“革命”，最早是在 20 世纪初由梁启超通过日本的翻译语而引进到中国的。

讲中国“革命”话语的转型，着重两端，一端是清末，另一端是 20 年代末。不过也正好，对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如何在 20 世纪初形成的，我做了一些研究。至于 20 年代末，我正在写一本书，有关茅盾早期的“革命+恋爱”的小说，涉及“左翼”的“革命文学”论战。那么趁这个机会一方面对清末的“革命”话语研究作点反思，涉及“话语”的理论转型及其研究方法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 20 年代末的“革命”话语研究提出“话语”的革命转型的一点看法，向大家求教。

## 一、“革命”与“话语”的研究转型

所谓“革命”话语首先是一个语言角度，主要是考察这个词语的现代命运。我在《“革命”的现代性》那本书里，有一些个案研究，说明从 1890 年代到 20 世纪初如何通过王韬、梁启超和孙中山这几位领导时代思潮的人物，“革命”一词的使用在中外文化的激烈冲突和交融的过程中经历了辘轳交错的话语旅行，形成了主宰 20 世纪中国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果以 1903 年邹容的《革命军》标志着“革命”口号走向大众的话，那么此后的中国人几乎天天把革命当歌唱，一唱唱了八十年。虽然我大致上弄清了现代中国革命话语的形成，但在研究中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

在中国照《易经》中“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民”的说法，“革命”话语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现代的“革命”意义不仅包含这个传统的“汤武革命”即指政治体制上的改朝换代，还融合了西方的 revolution 即指一般意义的变革。而这层意思，无论是王韬、梁启超还是孙中山，无不借自于日本的翻译。再深一层看，日本人用汉语“革命”来翻译 revolution，也绝非朝夕之功，那是在明清时代，日本人就意识到“汤武革命”的儒家经典不符合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需要，已经把它扬弃和改造，到了明治时代大力引进西方文明时，就顺理成章地拿“革命”来翻译 revolution，也把东亚历史纳入了“世界革命”的语境。这样看来“革命”话语非同小可，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河床里，其中流淌着民族的精髓和欲望，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亦功莫大焉。

“汤武革命”的话语，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是“图腾与禁忌”。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它代表“天命”，却不能随便说，事实上是一种禁忌。一方面是“革命”的沉默和缺席，但另一方面它无所不在。如果翻一下二十四史，表面上讲“革命”的屈指可数，然而正如福柯的“话语”(discourse)理论所说的，运作其间的是一种“排斥”(the system of exclusion)机制，即体现在它的背面，对于“造反”、“叛乱”、“贰臣”的口诛笔伐处处在是。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 20 世纪初短短数年间，禁忌一下子变成了图

腾,人人都可以自封为“革命”,于是天下分崩,鹿死谁手。然而没有这样一种持续而异常的革命激情,中国大约也难得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再看90年代以还,“革命”又一下子销声匿迹,如果作一个福柯式的发问:“革命”为什么又沉默了?这么提问并非为革命招魂,而是提醒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难道我们老是被动地为语言所书写?

我对“革命”词语的研究兴趣,根源于80年代初我在复旦读研究班,做的课题是晚清“诗界革命”运动,发现这个词是新的,是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才发明的,但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到了美国,读到许多国外汉学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发觉谈的都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变革,而没有关注“革命”词语及其意识形态的关系。有少数学者,如张灏先生在他的梁启超专著里对梁的1902年《释革》一文作了分析。另外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提到,梁氏使用的“革命”一语来自日本的用法。在这些研究启发下,我就顺藤摸瓜,一头埋在浩瀚的晚清文献里,追踪这一词语的跨国、跨语际的文化旅行。

在《“革命”的现代性》那本书的“后记”里,我用“神魂系之,转辗反侧”来形容我的长期研究“革命”的热情,其实反过来看,这一方面是学术惯性使然。在座的可能有这种体会,做完了硕士博士论文,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还有不少课题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也不尽然,就像我博士论文做的是明代江浙地区的文学,做文学的地域研究很有趣,也很有价值,在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不少这方面的课题,却没有继续做下去。之所以对“革命”研究孜孜不倦,主要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也可以说在国外产生了某种身份认同的困惑,和“革命”反而产生了一种吊诡的关系。

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50年代读了很多苏联小说,60年代初中学里还在学俄语。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大炼钢铁”收集废铜烂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戴上红袖章“破四旧”,可以说是天天浸泡在“革命”里。然而在“文革”期间因为写了几首诗、喜欢读“封资修”文学,于是被批斗、关押,在工厂里做了十年的小“牛鬼蛇神”。90年代起国内改革开放,令人欢欣鼓舞,但“革命”的记忆并没有消失,还常常如梦魇般地光顾我。既然“向革命告别”,喊了几十年的“革命”突然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于是产生种种疑问:“革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对20世纪中国人产

生那么大的魔力？它的沉默又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弄清这些问题至少能明白自己的过去，或许也关乎将来，当然这不光是我个人的问题。

初到美国时接触了一些研究思想史的著作，如勒夫乔依(Arthur O. Lovejoy)、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的，汉学方面读了余英时先生的书，对于那种强调“内在理路”的研究模式觉得新鲜，但钦佩之余又不满足。从国内带来的文学研究方法已不再适用，但有一点好处，就是对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陌生，这就比较容易接受福柯的“知识与权力”的理论。记得90年代初我做过一项关于居民委员会的研究，就声称运用福柯的方法，其实对他是一知半解。然而把“革命”当作一种研究对象，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转型，但我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置身于外，其实探索“革命”也是探索自我，过去的经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后来在加州洛杉矶分校读书，选了历史系艾尔曼(Benjamin Elman)先生的课，大受启发。他的《从哲学到语文学》一书是论述清代考证学派的，在1984年出版后好评如潮，也引起争论。书中称乾嘉学派为“考证话语”(K'ao-cheng discourse)，并把它看作中国帝制晚期的一场“话语革命”(a revolution in discourse)。这在当时是一种福柯式的提法，在历史学或思想学的眼光里，所谓“话语”是一种“虚”的论述。其实艾尔曼对于乾嘉学派的论述及其来龙去脉完全遵循史学实证的方法，但“话语”这一概念的确蕴涵一种新的阅读和诠释方式，即不把学派和学术局限于思想的范围之内，而是把学派的构成及思想论述的生产过程看作一种“机制”，在皇朝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中加以讨论，从而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实质。当时我在艾尔曼先生的指导下做明代中期李梦阳及其文学“复古”运动的研究，试图把文学社团放在文学、经学传统和政治权力的整体结构中加以探讨。

在1970年代之后的北美学界，“话语”成为人文学科的关键词之一，这当然和福柯著作的流行有关。德瑞福斯(Hubert L. Dreyfus)和拉宾诺(Paul Rabinow)在《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诠释学》一书中认为，在人文研究方面，“福柯一贯而有力地提供了另类理解方式的要素。对于发展人类的研究方法和诊断我们社会的现状来说，他的著作代表了当代最卓绝的努力”。“话语”一词含义丰富，指“论述”，也指具体的“语段”或

“文本”；由于“话语”含有对话、沟通之意，就蕴涵言说的“场域”。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普遍关注语言问题，自70年代以来有关“话语”的理论和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诠释学等学术与批评思潮相汇合。在我的理解中，“话语”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势力场域”(the force field)相仿佛，交织着人文有机体各种内在外在的因素，而“求真意志”(the will to truth)则是其中的“主心骨”。

“话语”研究其实也是对于历史和主体的重构，简略地说，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文本性”，即以文本作为基本的分析和解读的材料，也包含把语言本身看作物质化的指符。如福柯在《词与物》一书的第一章对于委拉斯开兹的《宫中侍女》一画所作的解读堪称典则。通过镜子、映射、模仿和人物肖像之间“关系”的分析来揭示“主体”的意义。对于“文学话语”来说，更重视修辞、叙事、寓言等形式与意义的问题。其次是“历史性”，如“知识考古学”所声称的，“追踪”(tracing)、“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历史性”(historicity)则成为重构历史的重要手段，而对于历史和记忆的发掘都与我们当下的生存意识具有诠释学上的“视境融合”。第三是“跨际性”(interdisciplinarity)，就是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化”对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传统来说并不陌生，但福柯也是针对现代学科的严格分际而投之以作为有机整体的人文观照，更重视打破“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与“人文科学”(humanities)之间的界限，如通过“监狱”、“诊所”等文明机制的历史考察而诊断病态“主体”的根源。这样的“历史化”既把文化视作具结构性的整体，又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在某一象征时刻的横断层切面，揭示各种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渗透，时时探询谁在说、怎么说、为何这么说。而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那里，如霍尔(Stuart Hall)在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中论述“话语”的意义如何在媒体传播和再生产过程中被解码(decoding)和重新铸码(encoding)的过程。第四是“批判性”，二战之后西方思想界一直在反思造成人类灾祸的根由，批判了历史主义、科学主义，而胡塞尔“现象学”从哲学方面对理性主体的质疑影响深远，至1968年学生运动更输入对于现存社会机制的激进批判动力，从这些方面可以说，福柯学说是应运而生，批判的锋芒直指18世纪启蒙思潮以来的主流价值。

他的第一本书《癫狂史》揭示 18 世纪以来西方理性机制与价值如何建立在“癫狂的沉默”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这种“癫狂的考古学”体现了对于“另类”的兴趣，如萨依德(Edward Said)所说的，福柯特别关注那些受文明压抑的“形式，走向监禁和知识的生产——对疯癫者、空想者、违法者、预言家、诗人、流浪汉和傻瓜的监禁和生产”。从思想史角度而言，“知识考古学”也提供了“另类”的思考途径，对于理性、科学的机制的探讨涉及语言与感知的现代性，后来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更明确地声称“医学视觉的考古学”，进而探讨“话语”与无意识结构及其规则的关系。他的学说在北美学界不胫而走，启迪了“后现代”思潮与弱势族群的文化政治；受他在视觉方面论述的影响，马丁·杰依(Martin Jay)等人在思想史方面另辟蹊径，开创了研究西方视觉现代性的学科，其目标也是批判西方中心主义。

我的“革命”话语的研究不完全依照福柯的理论，但我想这么来看他，尽管是一己的浅见，对今后的探索有所帮助。所谓“话语”和他的“考古学”相为表里，并不等于思想史，这么列出几点带原则性的，也适用于一般的人文学研究。我对晚清的文学文化的研究仍在继续，最近作了有关拿破仑的中国传奇在思想和文学方面的体现。从 1830 年代起他的英雄事迹就传入中国，大量的资料说明，起先是通过历史文本，后来通过文学叙事，他的英雄事迹不光是他的盖世武功和帝国霸业，而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民主的价值以及花都巴黎的浪漫风情，不断激起中国人的想象，切入国族想象的政治话语。到 20 世纪初，拿破仑被小说、电影、戏剧和画报等传媒大肆渲染而家喻户晓。胡兰畦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谈到，民国初年在四川流行两种女子发型，一种是华盛顿式的，另一种是拿破仑式的，由此可见他的名字挂在一般老百姓嘴边。拿破仑的中国想象几乎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到二三十年代之后这种生动的想象就没有了，他的事迹被纳入一种知识体系。

这个现象很值得细细推究，我还是用“话语”的“追踪”方法，具体讨论传播和重构的环节，谁是讲故事的人，在哪里讲，用什么方式讲，听众是谁等等，从而勾画出不同的拿破仑传奇、不同的文化空间与国族想象。至少我想指出，从思想史来说，拿氏的中土之旅某种意义上不啻是一部

西学,有助于我们对 19 世纪的西学东渐的认识。另外“拿破仑”是个翻译的语言指符,他的形象的不断重构形成一种“话语”,对于西学东渐起到“关键词”的功能,但又不是思想观念的那一类。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软性”的关键词,而在“话语”的分析范畴里还不足以体现其在接受过程中所涉及的情绪和感知方面的特征。这方面颇合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说的“话语辞格”(tropics of discourse),即使用隐喻、换置等修辞手段的“格套”,如拿破仑投射出楚霸王的影子,唤起“英雄末路”的情景时纳入了中国的理解模式,这样更利于在传播中不断的重复。

研究某一课题时,我常常想到在方法论上突破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探险,不一定指望它成功;对自己也是一种挑战,虽然有些东西不一定能想清楚。最近我在一篇谈论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的文章里把他的小说理论当作一种“话语”来处理,强调“想象”的成分,不仅是梁氏强调小说的想象功能,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小说的想象。正是在 20 世纪初文化意识形态处于某种真空的状态下,他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一呼百应,“想象”发挥了“魔力”,确立了小说负载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特殊身份。

我所使用的是实证的、历史化的方法,却强调“话语”的“虚”的一面。一方面我觉得像梁启超,特别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他的论述来源复杂,互相矛盾,充满着情绪、本能的反应。他的观念表述有不确定的成分,因此在分析梁氏的思想时,应当注意他的修辞,结合文学的分析方法,或更能反映那种黏皮带骨的情况。另一方面我觉得人文研究的性质本身应当是赋形生动,常常是意在象外,因此运用理论应当能体现这种性质,使理解和诠释走向多元和开放,而不是说死。当然我对语言现象的重视及“话语”研究离不开西方 70 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型的大环境,有时使我困惑的是,在怀特式的“后现代”历史学里,任何叙事的“真实”受到怀疑,由此也受到指责,是否我们斤斤考索“话语”的精致也意味着知识权力本身的“阳痿”?尤其在当下全球现代性高奏凯旋之时,连知识身份存在的前提也变得愈益脆弱。不过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革命”话语的研究的确涉及中国现代意识的某种历史形成及其结构,在这方面坚持“历史化”,至少让我们知道“革命”的来龙去脉,应当也是有点实在的意